

目 录

谭平山同志生平	谭汉威	(1)
高明农协与农军的组织者阮贞元	李林泉	(19)
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建设自由幸福的新高明	本刊转载	(24)
文选楼的光辉	李林泉	(29)
梁家祠	本刊编辑组	(32)
高明人民“倒钟”事略		(34)
我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及其《劝世良言》		
.....	黎荣才 黄国东	(43)
微型雕刻家冯公侠	黎荣才	(51)
“高明八景”考	仇荣佳	(55)
岭南诗人区大相	吴兆华	(64)
黄 官	仇荣佳	(68)
清末起义将领何丙	吴兆华	(76)
留得英名在人间——抗溜人物区怀翼	仇荣佳	(78)
文物与历史	仇荣佳	(83)
殷殷为桑梓 拳拳爱国心——民国教育界知名人士刘柱园	仇荣佳	(96)
智 除 三 虎	仇荣佳 麦旭和	(100)
封面设计	黄建强	
图片摄影	黄河清 仇荣佳	

谭平山同志生平

谭汉威整理

谭平山（曾用名谭彦祥、谭鸣谦、谭聘三），一八八六年农历九月初一日出生于高明县明城新元坊一个贫寒家庭里。平山祖母早年守寡，为人勤劳俭朴，靠代人缝衣服及编织蓆蓆为生。因相传几代单传，为了传宗继祖，平日省吃俭用，搭会积款（是民间一种自发的组织储蓄形式），想方设法寻求继子嗣养，以继香烛。平山父亲谭恢世原是高要县大乐棠村人，在童年时来明城过继后，只读过几年私塾，就替人当伙计，后做货郎，走村串巷摆卖些绒线，并在明城南街开设一间“和生”小店，卖些绒线（小洋杂）并代人裁缝衣服，每逢墟期，则在墟上摆卖。平山母亲李氏在家代人缝补衣服，弥补家庭生活。

谭平山父亲早逝，店务由其兄谭干祥操理。平山有兄弟姐妹五人，兄谭干祥、五弟谭君牧、二姐谭喜、三姐谭竹山，谭平山排第四。父亲病逝后，一家几口人生活更为困难。为了帮助解决家庭困难，平山曾在明城教过几年私塾。后来，其兄谭干祥察觉平山勤奋好学，颇能造就，遂不惜一切，竭尽全力，鼓励支持平山攻读。为了使平山心专志向求学，其兄曾以店中及家中一些财产作典押，向族中的祖尝揭借了不少银两。平山在极端窘境中，进入广肇罗实业中学，肄业两年，旋考进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当工读生。毕业后，曾

任雷州中学教员、校长，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后又加入国民党，曾当选为广东省参议会代表（即议员）。

一九一七年，谭平山奔赴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学习，和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著名的《新潮》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谭平山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积极参加这场运动，是“躬与五四运动为京沪提倡新文化之中坚分子”之一，曾被北京反动当局逮捕关押。一九二〇年初，他与同乡同学谭植棠、陈公博在上海创办《政衡》杂志，继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们不断地把北京地区出版的进步报刊、传单，《政衡》杂志寄给广州的进步青年学生；同时，他还亲自挥笔把北京的运动情况写给谭天度同志，并表示对广东运动的关切。“五四”运动后，谭平山参加了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领导，公开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活动。

一九二〇年七月，同时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的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从京经沪回粤，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高等法政学校任教。为了推动广州地区的运动，谭平山与杨匏安、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等同志取得联系，经过酝酿，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在广州水母湾木排头创办了《广东群报》，由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主持。《广东群报》主要是宣传“五四”运动意义，传播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揭露北方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把运动深入发展下去。它还连续刊载《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等著作，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

文章，对推动马列主义传播，启发和提高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为建党作舆论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每期印发一千份左右，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在这期间，谭平山写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专论和时评，攻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还深入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去，宣传“五四”运动精神，传播马列主义，对推动广东地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不久，谭平山等发起在广州建立了广东青年团组织。但由于当时“没有标明哪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因此，到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便停止活动。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的协助下，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出版机关刊物《劳动者》，据陈公博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说：这个组织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同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协助广东党组织开展工作。陈独秀为广东党组织草拟了一份纲领，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文，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经过争论以后，退出了党组织。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又重新建立了广东的共产党组织，稍后又正式称为广东共产党支部。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谭平山任书记。在此期间，广东党组织开办了一间工作干部学校，名为“宣讲员养成所”，招考了一批社会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造就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谭平山任养成所教员。此外，从一九二〇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四月，谭平山还兼任广州机器工人夜校董事长。一九二一年八月，党的“一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以张国焘为主任。在广东设立南方分部，谭平山兼主任。十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提出改组，目的是“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谭平山受上海总团委托，在广东组织分团。十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者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此时已有团员一百四十人。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在大会报告建团筹备工作及将来计划，并致答词。他在讲话中公开明确宣布：“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同月十九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素波巷召开第一次团员全体讨论会。讨论会议案有：本团组织大纲及总则，社会主义讨论会章程等九项。选举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何觉甫、蓝祥奎、冯菊波、沈原培等七人为章程审查委员。四月六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采用通讯选举法，选举谭平山为书记。五月二日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内举行开幕礼，谭平山在会上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并在大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五月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于广州东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五人，代表十五处地方团共五千余团员。大会由张椿年（太雷）主持，陈独秀及国际少年共产党代表达林等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广东团组织出席大会的代表为谭平山、谭植棠、梁复燃、陈公博等四人。谭平山就广东团组织情况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谭平山原被指定为广州代表，出席党的“二大”，但因同年六月十六

日寇猖狂在广州发动反孙中山的叛乱，陈、孙之间处于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因而没有出席。广东党的主要领导人因护陈反孙，受到党中央严厉批评，谭平山调离广州，陈公博（后被开除出党）、谭植棠均受到处分。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和冯菊波、阮啸仙、刘尔崧等四人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这次大会。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党组织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九月，中央局从广州迁往上海，谭平山留任驻粤委员。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谭平山担任区委书记。他在广州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在总的方针路线确定后，由于国民党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广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两党合作中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就由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进行。谭平山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积极动员组织广东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推动国民党实行改组。十月二十五日，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员，又是驻广东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通过他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协商解决国共合作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是最适当不过的。因此，党中央决定由谭平山参加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孙中山指定谭平山与廖仲恺、林森、孙科、邓泽如、许崇清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还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十月二十八日至翌

十一月十九日，共开了二十八次会议，具体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做出了四百多项决议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并决定于广州、上海两地为章程草案的试验场。谭平山和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专程赴上海筹组设立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机构，成立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中共广东区委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和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合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谭平山和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谭平山还担任《国民党周刊》撰述。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为周刊写了《国民党改组中应注意诸点》的专论，对于国民党的性质、任务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现在是国内人民和军阀战争的时代，只有结合国内革命分子，集中于一党的旗帜下，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逐出种灭国亡的危险。”文章还说：“国民党不是一个阶级的党，分开来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的党。”“从实际说来，现在国民党的分子有十分之七、八是劳动阶级，其余十分之二、三，也是中小（资）产阶级占多数。资产阶级少而又少，故现在国民党，绝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党”。他还特别指出，劳动阶级已经“成为今日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些言论，虽然不能说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民党能做出较为适当的评价，对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后，虽然重建了大元帅府，但是这个政府所能管辖到的范围，也仅仅是广州市及其周围不远的地区，广州四面受军阀包围，政权极不稳定。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军，各怀鬼胎，并不全心全意支持孙中山。谭平山领导中

共广东区委坚决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保证国民党改组工作如期进行。正当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国民党进行改组期间，十月，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攻占石龙，威胁广州。广州郊区也发生激烈战斗，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正面临夭折的危险。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广州各区分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前线局势，动员国民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根据地。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广州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响应号召，带头报名参加。带动了四百五十人加入义勇军之后，稍加训练，就成为一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义勇军”的成立，鼓舞了广州革命政府击退陈炯明进犯广州的信心。中共广东区委还组织了慰劳队到石龙前线慰问，鼓舞了前方战士与敌人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其中一半是由孙中山指定，一半由各省、市选派。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出席这次大会。孙中山主持大会，并在会上多次讲话。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报告》，并被指定为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等议案，以及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正式确定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

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和国民党要员廖仲恺、于右任、谭延闿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也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会议，推举谭平山、廖仲恺、季戴陶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谭平山和廖仲恺、戴季陶三人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

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内与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紧密合作，互相支持配合，重大事情的决定，双方都经过充分的协商和统一，使少数右派分子反苏、反共、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未能得逞。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相信和依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开展工作；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也动员组织党、团员，协助和支持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工作的进行，在国民党内形成一种新的团结合作关系。由于这样，广东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的伎俩，也一时未能得逞。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负有很重要的职责，他正确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了他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有利条件，分配和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各级重要部门工作，使共产党员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在广东各地深入发动工农革命运动。广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广泛进行。邹鲁等右派分子攻击谭平山，而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生前却称赞谭平山的工作认真负责，并拿他和右派分子谢英伯对比说：“谢英伯这班人

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陈独秀认为“这真是知音。”

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帝国主义也加紧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依靠工农群众，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分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而斗争。一九二四年十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首，发动商团叛乱，阴谋推翻革命政府。当商团叛乱迹象初露时，谭平山受孙中山派遣，与廖仲恺两人专程到中山县视察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为镇压商团叛乱做必要的准备。十月十日，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军人等万人大会警告商团。谭平山任大会主席，他在会上阐述警告示威大会的意义，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也在会上演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商团军的袭击，死伤多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心镇压商团叛乱，成立革命委员会，亲任会长，特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为全权委员。革命委员会并设立临时军事指挥部，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参加军事指挥部工作，动员组织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配合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政府军，一举平定了商团的叛乱。不久，中共中央为加强广东工作，派周恩来同志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专任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集中力量做好与国民党的合作，加强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出席参加，并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分工仍

任驻粤委员。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党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问题。通过各项重要决议，发表了宣言。这次大会根据国民党改组后已经分化为左、中、右三派的情况，制定了对国民党各派的政策：对于代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是扩大的政策；对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既要团结争取，又要批评斗争；对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右派，则要加以反对。代表大会以后，鉴于国民党右派活动的猖狂，冯自由、马素等在香港、上海等地造谣挑拨，继续进行分裂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谭平山根据党的“四大”精神，为了巩固左派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通过国民党中央于三月二十六日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三名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党。五月二日，谭平山根据国民党内的变化，写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一文，揭露了冯自由、马素、马超俊等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罪行，指出：“真正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国民党员，深知道党内不乏有反革命分子，深知道这种勾结帝国主义及军阀以达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始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这种假冒招牌的国民党员一日不肃清，党内的纪律一日不能整齐，党内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文章还指出：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党内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分化益加明显”。“这个国民党内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分化益加明显。”“这个国民党内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刚正分化时期中，全国的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内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加认清楚国民党员中的意见，那种是革命派的主张？那一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

谭平山的文章，刺到了国民党右派的痛处。右派分子戴

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中，疯狂进行反扑，**歪曲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特别指名道姓攻击**谭平山**。为了**粉碎戴季陶的反扑**，**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对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篡改和歪曲**，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瞿秋白**同志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逐一驳斥了戴季陶的谬论，支持了谭平山的论点。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广东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广东革命政府虎视眈眈，力图反扑。本来反对孙中山的**云南军阀唐继尧**，突然宣布就任副大元帅，**企图篡夺广东政府的领导地位**，以取代孙中山大元帅职位。驻广东的**滇、桂军也纷纷**自由行动，从东江方面开回广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和**南路军阀邓本殷**，以为时机已到，也在准备反攻广州。广东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以便能及时应付复杂局面。五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广东工作紧急，指定中央委员**谭平山**同志，并指定技术委员**周恩来、罗觉**同志，会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同志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谭平山为首的这个委员会，动员组织各地方力量，为击退各种反动势力的进攻、巩固广东革命政府而斗争。”

六月，驻广州的**滇、桂军叛乱**，谭平山为首的中共广东临委，经过研究以后，决定采取全面秘密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歼敌。具体的分工由周恩来负责发动**黄埔学生军及各友军**，谭平山负责团结和发动国民党左派力量，**杨殷、刘尔嵩**等负责发动**运输、邮电工人**，切断叛军交通、**电讯**。谭平山和**廖仲恺**并在河南的**土敏土厂**召集秘密宣传会

议，部署和决定宣传大纲、宣传口号，以及事先事后的宣传方法等等，以配合各军的军事行动。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工作，故东征军由潮汕回师广州时，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迅速镇压了滇、桂军阀的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

谭平山与国民党左派骨干廖仲恺紧密合作，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打击各方面敌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害怕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千方百计阴谋打击、暗害谭平山和廖仲恺，以达到他们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中共广东区委动员组织广州工农群众五万多人，举行追悼廖仲恺先生大会，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对外协会，发动十多万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大会，要求统一广东，肃清反革命。谭平山、邓中夏、阮啸仙、林伯渠等都在会上演讲，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谭平山任大会主席，毛泽东负责起草宣言，杨匏安负责起草党务报告决议案，阮啸仙负责起草农民运动决议案。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以后，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高举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推动中国革命广泛深入进行。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六人，其中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谭平山为这次大会的举行，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七个主席之

一，经他提议，由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一月七日，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做了《党务总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要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中国革命势力的团结和集中，是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一桩不利的事。因此，帝国主义者遂造出种种谣言，来破坏这个政策，更因两党合作，以及国民革命的日益发展，帝国主义者更加恐慌，不得不运用种种阴谋，挑拨离间，务使我们联合战线的政策中途崩溃，使帝国主义者的生命得在中国多延长几十年，这是帝国主义者最希望的事，但是本席要希望我们同志，千万不要上帝国主义者的当。”代表大会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严肃地批判和处理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一批右派分子，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

一月十六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和李大钊、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和林伯渠、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平山又继续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从此，谭平山又继续在国民党内团结左派，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孤立和打击右派分子，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斗争。

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发展，研究了党的中心任务，决定从各方面准备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

的統治，將革命推向全國。隨着工農革命運動的逐步深入發展，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買辦等，也加緊了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激烈。三月二十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向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突然襲擊。事件發生時，譚平山仍在北京，直到四月二十九日才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回到廣州。五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排斥打擊中國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按照這個反動議案的規定，共產黨員不能在國民黨中央機關擔任部長職務。議案被通過後，譚平山只好離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秘書處，但他仍然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身份，繼續進行革命活動。他對於蔣介石的陰謀和陳獨秀的妥協退讓，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極力主張給蔣介石以有力的反擊。他計劃以老同盟會員身份，聯絡實力派李濟深和廣東老國民黨員，準備公開與蔣介石和浙江系的反動勢力相對抗。雖然譚平山的這一計劃，最後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從此也可以看出譚平山當時的政治態度。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在莫斯科召開，譚平山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了這次全會。十一月二十三日，譚平山向大會致祝詞。二十六日，在討論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和庫西寧的報告時發了言。譚平山除了向大會提出一份關於中國革命的系統書面報告外，二十九日，又在會上做了《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譚平山在這次擴大全會上被選為中國委員會主席。十二月十五日，他代表中國委員會又做了報告。譚平山的這一系列報告，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具體方針、政策和策

略，批驳了反对派要求立即退出中国国民党的错误，强调了
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他指出：“所
谓国民党问题，我们指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在民
族革命过程中，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和确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目
标，这个战线是必要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
“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放弃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放弃无
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谭平山在报告中，还强调
要满足农民一切最迫切要求，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但是，他也开始忧心无法解决加强革命统一战线和
解决土地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因此，他说：“中国革命需要
有一个包括一切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革命统
一战线。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
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情
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我们的错误就在于，
我们未能利用这种矛盾来发展农民运动，同时又来巩固民族
统一战线。”谭平山的这一估计，在后来的武汉政府时期，
不幸而言中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全会根据斯大林在会上的演说
和谭平山的报告，并吸取了彼得罗夫提纲、米夫提纲和费
拉斯的意见，通过了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谭平
山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一九二七年二月，谭平
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起回到广州，四月到达武汉。三月
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
平山缺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治委
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四月九日，
谭平山又和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十三人，通电

就任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问题委员会，研究和解决全国农村土地问题；谭平山和邓演达、毛泽东、徐谦等被任命为土地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在武汉召开。谭平山参加了这次大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和其它各项重要决议案，谭平山再一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谭平山抵达武汉以后，继续为加强国共合作，巩固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南京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北方军阀而斗争，直到武汉国民党政府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止。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党通过了“分共”决议案，汪精卫密令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国民政府从此宣告分裂。这时，谭平山离开武汉，奔赴南昌，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时，谭平山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胜利（八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南昌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民主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被选为委员长。同一天，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谭平山是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共产党员之一。这个宣言，是中共中央起草并决定发表的。宣言的作用在于昭告国人，说明带领这么大的部队起义的目的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